

狄青讲述鲁班工坊的故事

记者 田莹

校全都参与其中,各院校结合自身特点和专业优势,设计特色专业、提供人才支撑,全情投入,才使得鲁班工坊能够迅速从本土品牌成长为国际名片。”

狄青极为推崇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吕景泉教授开创的EPIP(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教学模式,他说:“吕教授研究生毕业后没有直接站上讲台,而是深入实训基地,向老师傅学车钳铣刨,长期在企业扎根,积累实践经验。正是这种深耕一线的执着坚守,催生了具有开创性的EPIP教学模式——以工程化、实践性、创新型、项目式核心理念,诠释了天津职业教育‘工学并举’的历史传承。”

这个理念到底牛在哪儿?因为它系统性地整合了工程实践与创新项目,回应了全球职业教育的共同难题——如何培养既能执行又能创新的技术人才,并通过中国特色项目制教学落地。狄青解释道:“EPIP教学模式通过真实项目驱动,将标准化操作内化为创新基础。比如,在数控机床教学中,要求学生在掌握标准化操作的同时,还要针对本地需求来设计工艺方案。这种本土化创新,正是EPIP的精髓,也是中国职业教育向世界输出的原创理念。”这种模式,让中国的职业教育实践成果走向了国际舞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援教的艰辛与温暖背后是技术输出带来的变革

在长达5年的采访中,狄青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故事,而最让他心头发烫的,是那些在异国他乡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却饱含着动人的坚守。

江绛和高洋夫妇是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教师,他们在埃塞俄比亚从事教育援外工作已近15年。他们的儿子江天亚出生在非洲,名字中的“天”与“亚”两个字,分别代表故乡天津和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当狄青见到高洋老师时,她正为再次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做准备——既是为当地鲁班工坊安排后续教学工作,也是为探望仍在当地坚守的丈夫。

2011年,江绛刚刚到埃塞俄比亚援教时,目之所及,教学条件令人心酸:最基本的教学设备和实验器材都极度匮乏,许多实践课只能通过观看视频来完成;教材稀缺,常常带几个学生共用一本书。面对困境,他没有抱怨,而是主动调整教学计划,努力适应实际情况。这份真诚与坚持,让埃塞俄比亚教育部和当地院校的工作人员深受感动,他们一再挽留江绛,他的教学任期一直在延长。

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同样面临着种种“挑战”。江绛夫妇只能每两周去市中心采购一次食材,从驻地到最近的超市,公交车要间隔几个小时才有一班,他们多是步行往返,路程要耗费一个多小时。土路坑洼不平,鞋子穿三四个月就会磨破底。狄青感慨:“高老师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就像在谈论天气,仿佛这只是再平常不过

的生活插曲,但即便是天气,非洲的气候我们也不大容易适应。”

2021年,当得知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要在埃塞俄比亚筹建鲁班工坊时,江绛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并成为这个中非合作项目的负责人。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院长郑勇峰,向狄青讲述了全球首个鲁班工坊在泰国大城技术学院初创的故事。那是在2016年,郑勇峰还是一名青年教师。他和同事拉着塞满实训设备散件的行李箱抵达泰国时,距离揭牌仪式只剩下一个多月。

泰国潮湿闷热的天气,让工作变得格外困难。语言的障碍也带来了不少趣事——中国教师不会泰语,泰国教师的英语也不够流利,双方主要靠画图 and 手势沟通。渐渐地,他们竟琢磨出一套独特的“电路图对话”,简单画个电路图,不仅能讨论教学内容,还能交流日常生活。在这种特殊的互动中,两国教师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当泰国教师结婚时,还不忘给已经回国的中国同事发来喜讯。

这些温馨瞬间的背后,是技术输出带来的深刻变革。在巴基斯坦,经过培训的学员成为中资铁路售后服务的骨干;塔吉克斯坦光伏专业的毕业生,已是中国电站争相聘用的技术人才;而英国鲁班工坊的食品展示窗口,则为天津企业打开了海外市场。正如狄青所说:“鲁班工坊就像一个技术基站,让中国企业在当地扎根生长。”

鲁班工坊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超出想象。狄青在采访中收集了太多的故事:在乌兹别克斯坦,家长们为了让孩子获得进入鲁班工坊学习的机会,凌晨就到报名点排队;在印度,当地政府主动前来寻求合作,希望引入天津的职业教育模式,因为他们看到了周边国家的学员通过这项培训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有一位鲁班工坊的老师告诉狄青,在非洲的工坊开放日,村民自发带着水果来感谢中国的教师们。这种认可,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量。这些细节让狄青深刻理解到,技术输出为当地百姓送去的不仅是谋生技能,更是尊严。

展示职业教育实力 工匠精神没有国界

2020年,狄青想静下心来写点东西,正巧发现了鲁班工坊这个发源于天津的国际项目。“我跑了二十多年基层,对天津的工业发展和教育脉络还是比较熟悉的,直觉告诉我,这里面会有值得写的故事。”他坦言,与百花文艺出版社沟通时,双方对选题一拍即合,都认为有必要为这个源于天津的创新实践留下完整的记录。

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波折远远超过了预期。职业教育领域的专业性、跨国项目的复杂性,让采访充满了挑战。而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让本就复杂的采访雪上加霜。“在海外的天津教师回不来,国内的职业院校又因为封闭管理无法进入。”狄青

回忆说,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只能通过微信语音和越洋电话搜集素材。即便如此,他也从没想过放弃。

在他看来,鲁班工坊的故事有三个必须被记录的理由:一是天津作为发源地的意义,这套从天津走出去的模式,已成为中国工匠精神“国际名片”,这段故事应该由更了解天津工业基因和城市发展脉络的作家来完成;二是那些用青春铺就海外职业教育之路的建设者,不该被遗忘,他们在异国他乡传授先进技术的同时,更播撒着友谊的火种;三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云端坚守”,大家靠视频“云揭牌”、隔着屏幕传授技术,这些在困境中迸发出的创新行动,都有着鲜活的时代印记。



狄青

天津人,作家,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文学自由谈》杂志主编。出版《卡尔维诺年代》《与文学相关的一些话》《回马村记》等著作。

在狄青看来,好的纪实文学作品既要精准,又要有温度。为了确保内容的严谨,他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书稿历经多次修改完善,先后请职业教育专家及相关领域学者进行了多轮审核。这种执着,让《鲁班出海》逐渐被打磨成一部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性的作品。他希望这本书能够让世界看到中国职业教育的实力,让国人了解天津在这个领域的国际贡献,也让年轻人明白,工匠精神无国界,认真做事的人永远值得尊重。

“在古代,鲁班用发明改变了百姓生活;在今天,鲁班工坊用职业教育影响着全世界。”狄青说,这正是他想通过这本书传递的理念——无论是天津的蓝领工人,还是非洲的技术学员,只要怀揣匠心,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创造不凡。

狄青访谈

天津手艺人有务实精神 耍嘴皮子不如亮真本事

记者:您生在天津,长在天津,天津的城市气质、工业文化是如何影响您的关注视角和创作风格的?

狄青:我曾在天津的一家杂志社工作多年,早期跑企业,去过很多工厂,后来跑农村,到过六七百个村庄,对基层太熟悉了。咱天津近代工业有太多的第一,技术工人历来深受重视。天津是最早对技术工人评级的城市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八级钳工的工资、社会地位都堪比今天的大学教授。这种对手艺人的敬重造就了天津人“耍嘴皮子不如亮真本事”的务实精神。

这种城市气质也深深影响了我的创作,教我学会了接地气的观察视角。当记者时记录的那些面孔,都成了我的故事宝库,所以我的小说更关注市井巷陌的普通人,关注他们的坚韧、憨厚、狡黠,甚至带点自嘲的生存智慧。而在随笔创作中,我并不喜欢摆出一张教化者的面孔,面对种种文化现象,我可以惊叹、愤慨、自负、反思……我不想做读者的人生导师,而想成为他们那个眼光犀利而又平实风趣的老友。

记者:创作《鲁班出海》这本书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狄青:怎么才能把严肃的题材写活,是我遇到的最大挑战。这本书涉及政策、外交、教育等方方面面,可以说“严谨”是创作的第一要义。但如果写得太生硬,通篇都是建了多少工坊、培训了多少工人等冰冷的数据,纪实文学就成了汇报材料,失去了可读性。因此,在创作中我尽量平衡真实性、准确性和艺术表达的关系,尝试通过一个个人物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来呈现这件事的意义。这些人物一立起来,这本书就有了温度。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还会认可“手艺值钱”这个理儿吗?

狄青:不仅会认可,而且手艺越来越吃香了!国家大力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要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在天津,这一传统优势正在焕发新活力。我去渤海职业技术学院采访,有个学化工的小伙子,实习时在车间调试设备,企业直接开价月薪过万,比坐办公室的白领还要高。他说:“我爷爷是老工人,总说有手艺饿不着,现在我信了。”

天津职业教育有个鲜明特点:传承与创新并重。我们既有自大沽船坞延续下来的工匠精神,又紧跟国家产业升级的需求,像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这些新兴产业,不少职业院校都开设了对应专业。现在的年轻人很务实,他们看到国家政策对职业教育的支持,看到高级技工享受人才补贴,自然就明白了“一技在手,终身受益”的道理。不少“90后”“00后”也在用实力证明: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技术工人的职业前景越来越广阔了。

记者:在《鲁班出海》出版之后,您有哪些新的创作计划?

狄青:这两年我一直揣着个念想,就是写一部天津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专写当下的企业,还有那些新工人群体——他们手里攥着新技艺,身上带着时代的精气神,这是之前很多天津工业题材的作品里相对不太多见的。我平时工作比较忙,正经坐下来写长篇的时间少,倒是零零碎碎写了不少随笔、杂文。可这部长篇不一样,它在我脑子里盘桓太久了,哪怕写得慢,哪怕要在零碎时间里一点点抠,我也得把它完成。我知道写身边人、眼前事很难,更难的是要写出时代的筋骨。但我就想试试,写出他们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写出天津工业现在的模样。我觉得自己不仅是想写一段故事,更是想为这片土地的当下,留下点实在的文学印记。

(图片由狄青提供)

讲述

《经典的炼成》开启一场穿越百年的思想对话 重返鲁迅的精神故乡

口述 阎晶明 整理 何玉新

不久前,“鲁迅的世界与经典的启示——《经典的炼成》新书发布会”在首都图书馆举办。著名作家梁晓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与本书作者阎晶明深入探讨了鲁迅及其作品的影响。

梁晓声认为,鲁迅的文学描写细致入微,上承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在今天仍有传承的必要,对当代写作大有裨益。韩敬群将《经典的炼成》称为“大家小书”,篇幅不长,但内容高度浓缩,是研究智慧的结晶。

阎晶明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电视艺术评论、鲁迅研究。《经典的炼成》一书以经典为引,以文本为路,重访鲁迅的精神故乡,开启了一场穿越百年的思想对话。在经典的重读中,鲁迅这一镌刻在中国人集体记忆中的灵魂不断复现,为当代人的生活与写作秉烛指路,又开天地。

当下我们研究鲁迅 应该学习他的凝练

《经典的炼成》这本书,收录了我近年来写的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研究



阎晶明

的十篇文章随笔。这个书名是书中谈《孔乙己》的文章的标题,也是我在陕西的《小说评论》杂志上开的一个专栏的名称。我的目标是,对于鲁迅小说中那些社会影响大、文化史上有地位、研究者关注和分歧都比较多的作品,逐篇进行分析。我也想做一点关于鲁迅小说专题性的研究,比如鲁迅小说中对衣着的描写。

其实关于鲁迅小说的研究文章、著作已经有很多了,不需要我们再来增加什么。但这就是经典的魅力,研究者评论得再多,阅读者的感受还是没有完完全全地被说出来。当我们读鲁迅作品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也想说一说、评一评。所以在每篇文章开头我都要强调一下,在我看来,这篇小说最独特的是什么。

比如《故乡》,早已经进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上过初中的人基本都知道,但专门研究它的文章比较少。我想提出一个话题:《故乡》并不那么简单,它很复杂,不光是要分析小说的艺术性,还要研究它的发生,鲁迅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他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这篇小说既有故事性,也有杂文式的议论、说理,还有散文式的抒情,鲁迅是怎么在这几千字的篇幅里,把这三者糅合到一起的?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

《祝福》讲的是祥林嫂的故事,我也要找到它在鲁迅小说里面的不同点,这个不同点不一定是我的发现,但是它非常重要。祥林嫂在鲁镇打工的时间比较短,不过她一生的命运都是在鲁镇这个舞台上展现出来的。鲁迅并没有从祥林嫂年轻时写起,然后不停地转场,到最后离世,而是直接写了发生在鲁镇的她的命运交响。

说通俗一点,这就是高级小说,它的戏剧性、小说性都体现于此。这些可能别的研究者也谈过,但是我认为还需要不断地强化。他能在很短的篇幅内,写出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所以今天的作家还是应该研究鲁迅,去学习他是怎么提炼、怎么浓缩、怎

么挖掘的。

《一件小事》作为小说来讲,其实是不大成立的,但它在鲁迅小说中又非常重要。比如其中提到人力车夫,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胡适到闻一多、徐志摩,各个流派、各种观念的作家,都在作品中写过人力车夫。而鲁迅的《一件小事》里面的车夫形象,有太多值得分析的东西,既代表了时代,又有其典型性。

鲁迅没有闲笔废笔 每一笔都值得回味

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问他,你写了这么多小说,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篇?鲁迅回答,是《孔乙己》。在不足3000字的文章里,他写出了一个苦人的潦凉,而且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法,是中国风格。

当今网络时代,年轻人都说,脱不下孔乙己这件长衫。孔乙己成了热词,这个热词跟长衫有关,变成一个社会身份的符号,变成一个人的身份和现实处境之间产生差距和错位的标志。

鲁迅写孔乙己这件长衫,不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对生活的提炼。在孔乙己所处的时代,长衫是脱不下去的一件衣服。过去绍兴的算命先生,自己穷得活着都难,但身上的长衫却是他身份的标志,解开长衫,里面可能连件背心都没有。当地老百姓都有这个认知,而鲁迅把它用在了小说中。

从五四运动时期到上世纪30年代,长衫一直是身份的标志。鲁迅写过一篇杂文,讲一辆人力车到一个

人的长衫,车夫遭毒打,最后还被抓了起来。说明鲁迅对长衫非常敏感。在他的小说《一件小事》中,人力车的人就穿着长衫,拉车的肯定是短衣,到冬天也只能穿单衣。

鲁迅的小说《风波》里面写到的长衫更为典型。赵七爷一辈子就穿过三次宝蓝色竹布长衫,都是于自己有利、对仇家不好的时候。别人只要看到赵七爷穿着这件长衫走出来,就知道他肯定遇到了什么事情。最后这场“风波”降下去,也与这件长衫有关——七斤嫂发现赵七爷把长衫脱了,又穿回原来的衣裳,坐在书桌前。所以,在鲁迅小说里面,服饰不仅仅是人物肖像的一部分,更与主题密切相关。脱了长衫可以说就没有孔乙己这个人物了,而没有宝蓝色竹布长衫,也就没有了《风波》这个故事。

包括金钱,在《孔乙己》中,鲁迅不但写到钱,而且写得特别精细:一碗黄酒需要四文钱,一碟茴香豆需要一文钱,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小说的结尾,掌柜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鲁迅的这个钱数不是随便一写,孔乙己即使喝一碗黄酒,都不敢标配一碟茴香豆,所以最后欠的是四碗黄酒、三碟茴香豆。鲁迅没有闲笔,没有废笔,每一笔都值得斟酌回味,这就叫经典。

为什么直到今天孔乙己仍有生命力?因为他是一个于历史夹缝中存在于的人,新和旧都与他无关,新的不会干,旧的他也干不了,所以就变成“多余的人”。他又好喝酒,又做不出什么成绩,写字也写不成。这种感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也会感受到。他是一个典型人物,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初读之时似曾相识 重读也跟初读一样

经典必须接地气,才有意思,而不能是高高在上。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有一个关于经典的定义:经典不是你正在读的书,而是你正在重读的书。意思是说,你没有读过这个作品,但一看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生活里的很多道理都在这个书里面,所以觉得好像之前读过。重读也跟初读一样,比如《红楼梦》,读第五遍、第十遍,感觉都不同,因为你的年龄、经历,外部环境都在变化,读时的感受自然也会改变。

鲁迅小说也有着这样的特点,不是只有鲁迅的研究者、只有把《鲁迅全集》读了多少遍,才能读懂鲁迅小说,而是可以从很多很多的方向进入。比如《故乡》,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篇写故乡的美文,特别适合同初中生、高中生推广。《故乡》也不只有文字之美,也不只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样的金句,它的故事具有多重性、复杂性。这就是经典的一个品质、一个特征。

鲁迅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但一般作家达不到他的境界,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自身水平能力不足,另一个是对于认识现实生活缺乏热情和兴趣。而鲁迅对普通民众的生存境遇有着深刻的感受,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他会看到自己没有的东西,看到人性的光辉。

鲁迅跟他所处的时代、跟他生活的社会,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民众有密切关联。他所有的作品都诉之于内,其文学性是自然生成的,具有多重智慧,很难用教科书去规约他,这也形成了我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